

利玛窦

「日」平川祐弘／著

传



光明日报出版社
刘岸伟 徐一平／译

利 玛 窦 传

平川祐弘 著
刘岸伟 徐一平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玛窦传/(日)平川祐弘著;刘岸伟,徐一平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1

ISBN 7-80145-088-4

I. 利… II. ①平…②刘…③徐… III. 利玛窦(1552~1610)-传记 IV. K835.4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082 号

©Heibonsha Limited, Publishers 1969

利 玛 窦 传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11.125 印张 200 千字

1999 年 1 月 第一版 1999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45-088-4/K·5

定价:18.00 元



利玛窦的这幅肖像于利氏死后不久在北京绘制，由金尼阁带回罗马，至今保存于耶稣会总部、罗马的 Chiesa di Gesu 大教堂。利玛窦身穿儒官的绢服，金尼阁解释说乃是“中国的博士”的服饰。

1427/5

中文版序言

自古以来,不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化意义上,中国都曾经是一个自足完满的世界。然而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以及闭关自守政策的废弃,固步自封的中华之国亦开始逐渐变为世界中的一个中国。既然成为世界中的一国,一种文化,中国则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疏通交往。作为亚洲之一国的中国,不仅开始与地球社会的其他国家缔结国家间(international)的外交、贸易关系,也开始与不同于中华文明的其他文明社会建立文化间(intercultural)的关系,互通有无、相互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何曾像今天这样,众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外国文明,何曾像今天这样,中国的精英努力钻研外国语,这可谓是亘古未有的新气象。

不论对于锐意推进现代化的今天的中国人,还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人,最为重要的异质文明乃是基督教背景的西洋文明。对于二十世纪末的日本人来说,第一外国语为英语,第二外国语是汉语。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外国语也是英语,第二外国语则是日语。英语所代表的西洋文明对于亚洲人如此至关重要。

如此看来,中西文明在历史最初期如何相逢,自然而

然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题目。两者的邂逅当然体现在各种层次,并以各种形式表现。我之所以将考察的焦点设定在汉语名称为利玛窦,这位意大利人基督教传教士 Matteo Ricci(1552—1610)身上,是因为他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而且他依据这两种文化的知识与见识,面对东亚的诸国民使用汉文著述,面对西方的读者则以意大利语写下了书信及报道。我把这位多才多艺的利玛窦看做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uomo universale)。我对他的关注,并非因为他是一位传教士,更多的是基于如下认识:即他是一位立足于,并掌握了东西两种文化的“两脚踏地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利玛窦乃是我仰为理想的人们的先驱。

不过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台湾、韩国亦是如此,在日本 Ricci 仅以利玛窦的名字,即仅以其汉文著述而闻名。因此我写作这本书,力图不仅通过其汉文著述,也通过他留下的意大利语书信和著作从东西方两个方面来探索这位“两脚踏地的人”Matteo Ricci。如果说本书还有些许特色的话,那就是来自一种复眼的视角:即著者从西洋与东洋两个侧面,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对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初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接续点上的利玛窦做了这样与那样的考察。

下面让我们就以往各国对利玛窦的评价做一概观。东方的利玛窦评价是较片面的,但是在西方利玛窦的形

象也相当偏颇。我在本书的 244 章里已叙述过，欧美有一种可称作“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颂歌”的文学传统。利玛窦的形象亦在这种基督教传教颂歌史观当中被描绘而成。令人困惑的是，在东亚一方也有人去竭力附和。改信基督教的东方人如此崇敬利玛窦，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既然有如此狂热的一群崇拜者，那么同样狂热的、持意识形态观点的人们的出现，亦并非不可理解。那种教条主义的传教士批判今后亦会反复出现，卷土重来。

那么有别于上述立场，是否可以将利玛窦看做与宗教无关，来自西方向中国传播自然科学与地理知识的外国人专家呢？明朝宫廷允许利玛窦留居北京，就是因为承认并欣赏其作为技师或专家的能力。利玛窦的确是科学史、地理学史上的人物。但是他同时不亦是思想史上的人物么。而且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显露身姿，也是在日本思想史上、西洋思想史上留下出人意料的身影。他本人或许不能称为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但在思想传播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在本书中还探索了利玛窦汉文著述及欧文著作所带来的余韵余响。利玛窦一方面向东亚传播了西洋的几何学思维、地理学世界观、人文主义立场及基督教宗教观，另一方面把中国文明及特色介绍了西方。就这样利玛窦给后世留下的影响之深几乎超越了他本人的意识。对这一点应特别指出并记述下来。

介于上述问题的关联，下面就如何认识异质文化略

述二三。我以为到国外去的人，重要的不是向对方传授什么，而首先是自己向对方学习。十九世纪末年，一位德国人传教士利希阿尔特·比尔海尔姆来到中国，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宣讲基督教之前，首先有必要学习中国的文化，他本人亦去身体力行。他说道：首先必须摆脱“用自己（西洋人基督徒）的尺度去衡量非基督教圈的诸现象的陈腐的神学观念”（新田义之著《利希阿尔特·比尔海尔姆传》，筑摩书房）。这在当时一定属于少数意见，但而今回想起来，难道不是言之成理吗？

对利玛窦这位传教士的人与业绩，也有必要采取与之类似的观点与重新评价。即改变以往仅注目利玛窦传教士一面的做法，而应重视认真研习中国文化，将中国情况介绍给西洋的汉学家的一面，这种视点的转换对西方来说尤为重要。譬如科举的考试制度经利玛窦介绍到欧洲，虽说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不是依据出身门户，而是以能力考核选拔人材的制度得以在欧洲落地生根。这可谓是中国带给西方的、文化上制度上应大书特书的刺激传播。众所周知，人类创造出的、公平推选国家干部或领导人的两大和平方式，其一是中国发明的笔头考试制度，另一则是西方创造的选举制度。而西方很早就采纳了起源于中国的制度，其进取心令人瞩目。在今后的世界上，不论由东向西的人，还是自西往东的人，在传教宣传鼓吹自己价值观之前，首要的是自己向对方学习，学习那些得以通用于世界的普遍价值。

但是为了真正理解对方,听来似乎是一种反论,则必须开释自我,不断与对方展开对话。而首先要持有可以开释的自我,并且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善加表述。利玛窦的宗教论《天主实义》之所以意味深长,想来是由于他将基督教的教理与儒教、佛教做以对比,而加以阐述说明。利玛窦乃是以那种形式与亚洲人展开对话的第一位西方的东洋学家。针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最为尖锐的反驳之一似乎出自日本人不干斋哈比庵,其详细情由今后值得研究。

此外,听来似乎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利玛窦发现了中国这个有别于西洋的另一个文明社会,并将其事实传达给欧洲,因而他对基督教的相对化做出了贡献。这乃是坚信基督教绝对权威的耶稣会和利玛窦本人都绝无可能逆料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利玛窦不知不觉地扮演了承认复数思想及宗教共存的、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先驱的角色。关于利玛窦,对他的意图所在做微观的精细调查是必不可缺的,而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对超越其意图的背景做一宏观鸟瞰亦是十分重要的。

这一次经刘岸伟博士和徐一平博士之手,既非学术书,又难称作通俗书的拙著被翻译成中文,这对著者来说可谓望外之幸,三卷本今已杀青,记下些许感想是为中文版序。

原著前言

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客死于北京的 Matteo Ricci,乃是在东洋史的教科书或概论中时常以汉文名利玛窦出现的耶稣会士。通过这类教科书,利玛窦的名字已广为流传,但其为人及业绩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在日本以往则几乎寥无介绍。这大概是由于利玛窦的活动范围跨越东西两大洋,其影响在汉字文化圈不仅限于中国还波及到日本,在欧洲则涉及到法国等各国,按照以往的学问分类的框架及训练是很难做整体把握的。

笔者前些年在翻译 G. B. 桑索姆的《西欧世界与日本》一书时,得知这位曾出任英国外交官的比较史学的硕学怀抱一种共感提及利玛窦的事迹,而感到兴趣油然。想来桑索姆亦是由西洋来到东方,学习当地的语言、与当地人为友、对所在国情展开学问调查,所以他在三个世纪前进入中国的利玛窦身上看到了自己学问前辈的身影而感到可亲可佩吧。笔者也曾前往利玛窦的故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在长期寓居期间,根据自己的海外生活体验,不禁设身处地对来到东方的利玛窦做了种种遐想。

利玛窦承受着孤独而勉学不息磨砺自身。笔者对这

种外柔内刚的人格深感受惜。这位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只身进入明末的中国，以他的汉语知识、文理两科的学问以及人格的魅力成为深受中国人欢迎的有用之才，并由此打下根基以试图贯彻自己传教的目的。像利玛窦这样的自律人格，令人感到一种西欧人自我形成的伟大。一边写作这部利玛窦传，笔者不禁回想起在大学读书时每星期三次于日法学院授徒的已故S·康德神父。外国人传教士利玛窦生活在异地他乡，研习当地文化，喜爱那里的人们并向那里的年轻人传授学问，笔者之所以对他深怀敬意与兴趣，追根溯源想来大概是由于我曾接触到康德神父那样的卓越的人格。但是笔者研究利玛窦不仅仅出于这样一种个人的角度。我以为透过十六世纪后期意大利人利玛窦个人的目的来观察明末的中国，可以为我们进行比较文化史考察开辟殊为宝贵的视野。

就行文叙述而言，笔者重视人文主义的切入手法，通过书信著作接近利玛窦，试图借重利玛窦的眼睛来观察历史。谈到利玛窦其人，我不仅希望把握他的理智部分，还祈愿深入他的感性世界。在描述过去的历史时，那种凭依历史法则或意识形态的做法，尽管施以学术性的粉饰，其实往往只是知性怯懦的表现，揭示了无法如实把握对象真态的感性的迟钝。我时常觉得相信先验的理论权威，将史实硬塞进一个模式的做法，虽声称科学性而实为知性的诡诈。

这部利玛窦传中的观点及见解，可能在某些地方不

同于以往按照国别单位纵轴的历史解释,并与现成通行的观念相反。但是既然我们是以国家间、文化间这一横向关系为轴,来比较考察公元一千六百年前后的欧洲与中国,那么与既成的概念评价相抵乃是极为自然的归结。就同一事物,纵观与横看其印象是不同的。如果说本书还多少有些独自价值的话,想必就是从人们颇感意外的角度观察历史,尝试了文化的比较。在进行比较考察这一点上,当代的日本与中国及西欧相比,正因为其中华意识的传统较弱,反而处于有力的位置亦未可知。

笔者不虞才学菲薄而涉足这一领域,以为这种考察对学生时代怀抱的宿愿,即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会有所裨益。第一卷的内容就是根据国际文化振兴会主办的杂志《国际文化》上连载的文章增补而成的。在此对那些脚踏实地为国际文化协作耕耘的振兴会的各位同仁、特别是负责编辑的诸氏深表谢意。此外,就汉文的解读,户川芳郎、今西凯夫、前坊洋诸先生不吝赐教,对上述诸位以及平凡社东洋文库编辑部的各位谨表谢意。本书第二卷将刊出第三部“泰西儒士利玛窦”、第四部“对德川时代日本的影响”、第五部“在欧洲的反响”。

驹込站前杜鹃盛开之际,记于东洋文库图书室。著者

第一部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 1 目标的转换——从日本转向中国

“根据我们从日本这个国家得来的切身体验,可以向各位报告如下的一些情况。”

提起 1549 年,由罗约拉^①组织起来的耶稣会得到教皇承认才仅仅过了九年。参与草创的同志之一方济格沙勿略那时已经来到远东日本开始布教活动。在抵达九州八十天后的 11 月 5 日,他从 Cangoxima (鹿儿岛)写信给在印度布教总部卧亚的会友,这样描述了日本的第一印象。

“首先,日本国民是我所遇到、迄今发现的诸国民中最优秀的,我觉得在异教徒中不会有什么人种胜过日本人。他们举止有礼,大都很善良,不狡猾。对名誉之看重令人吃惊。名誉对于他们来说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他

^① 罗约拉—Ignatius de Loyola (1491—1556) 耶稣会的创立者。反对宗教改革,主要著作有《灵操》。

们一般都很贫穷,但是不论上层阶级还是下层人民并不认为贫穷是一种耻辱。”

这位在印度、东南亚度过七年岁月的欧洲人神父来到东洋的边陲,遇到了“才智不逊于欧洲人的国民”,他不禁感到一种充实和喜悦,他可以在此充分施展抱负了。沙勿略的书简中随处流露出对日本人市民道德的赞誉。尔后抵日的三浦按针^①、坎贝尔^②亦曾有过类似的感触,可见当时国际社会评价日本人国民性之一斑。

尽管沙勿略怀抱着炽热的使命感,决意在这样一块令人瞩目的土地上弘布信仰,可他在日本逗留了两年之后,便已着手进入中国的计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毅力坚韧、颇具武人风貌、出身于巴斯克的传道者朝秦暮楚、见异思迁。身为基督教东方布教前沿指挥官,通过在日本的所闻所见,他敏锐地察觉到要使日本人改变信仰,首先必须让日本人所尊敬的中国人皈依上帝。我们来翻阅一下传教政策的起草人沙勿略于1552年1月29日写给欧洲会友的信札。

“……中国位于日本群岛的附近,(佛教的)宗旨从这里传入日本。中国国土辽阔、和平安泰、没有战乱。据那

① 三浦按针—Adams. William (1564—1620)第一位来到日本的英国人。曾为德川家康的外交顾问。

② 坎贝尔—Kampfer. Engelbelt (1651—1716)德国医生,博物学家。1690年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随船医生来到长崎,逗留此地至1692年10月。1712年出版《日本周游奇观》。

里的葡萄牙人写下的见闻,中国人非常崇尚正义。他们的政治比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公正仁义。据我在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所见来判断,中国人具备很高的教养,比日本人更聪明。那里物产丰盈、人口众多、拥有许多大都市。……在 1552 年中,我期待能到中国国王所在的地方去。我认为中国很适合弘扬我主基督的信仰。一旦中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将极有助于日本人对(中国传来的)宗教宗旨产生怀疑。日本距离梁波^①(宁波?)这个中国重要市镇仅有八十勒瓜的水路^②。”

倘若日本人了解到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神圣誓约,他们就会立刻丧失自己对佛教的信仰。以少数精锐为宗旨的耶稣会士们必须有效地展开布教活动。考虑到中国文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威信——实际上被日本人理想化了的中国的幻影似乎已经反映在沙勿略描绘的肖像中——沙勿略决心追根溯源,转向中国。不仅如此,他准备前往皇都进入宫廷,首先使中国皇帝皈依,自上而下推行基督教。日本经历了应仁战乱,犯上作乱的风气弥漫全国,而“中国是个国土辽阔、泰平无事并以著名的法律统治的国家,国王仅只一人,而且人民绝对服从国王”。

① 梁波—葡萄牙人称宁波府南面海上的双屿港岛为“梁波”(Liam-poo)。这里曾是明末海盗猥集的走私贸易据点。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纨曾率兵扫荡其巢穴。

② 大约相当于四百五十公里。宁波与九州间的实际距离约为其两倍。(原注)

这对沙勿略来说,可谓天赐良机。他自告奋勇,在同年4月9日从卧亚写给罗马总会长罗约拉的信中这样写道:

“六日以后,蒙我主的保佑,三名耶稣会士、其中两名司铎,一名是修道僧决定前往中国国王的宫廷。这个国家是日本的近邻,非常广大,辈出了许多才智聪敏的学者。据迄今我所得知的情况推测,学问在中国极受尊重,愈是学者愈具权威。日本的各派宗教均起源于中国。我们确信我主之圣名将在中国显现,我们决意到中国去。”

就这样,继日本之后,中国出现在耶稣会遍布全球的活动范围中。我们不禁要问,沙勿略想象中的乐土又如何映入那些身临其境的西方人的眼中呢。耶稣会士踏入明末的中国,他们究竟目睹了什么,有何所感,有何所思,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而那些生活在这东方文明古国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迎接诗赋中所述“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的“西国诸子”呢^①。怎样排斥他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又给予了什么?此外,沙勿略试图利用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日本推行基督教,这一政策又给德川时代的日本带来了怎样的结局?尽管当初的设想落空,但是通过中国,西欧文化的波纹间接地、或多或少波及到日本。这又是怎样一种出乎意料的曲折历程。一种求知的渴望引导笔者去追溯那些继承沙勿略遗志深入中国的耶稣会

^① 万历时的名宰相、为神宗所推重的叶向高的作品。请参照第86章。(原注)

士们的足迹。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简洁地回顾一下中国与欧洲以往的交流,在历史的深邃视野中展示东西文化相遇的一章“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 2 中国与欧洲

尽管人们知道,早在哥伦布以前北欧海盗就曾远渡美洲,但是 1492 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之所以被奉为伟人,那是由于在他发现以前先人未有任何作为,而哥伦布以后,欧洲人染指的美洲史才陆续展开。

如果说耶稣会士发现了中国文化,其意义似乎亦可做同日语。中国与欧洲的交流始于公元前,东汉时中国文献中的“安敦”即指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①。当时中国产的丝绸在穷奢极欲的罗马上流阶级之间,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不过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这种贸易也一蹶不振,海陆的交通亦随之断绝。通向拜占廷帝国的“丝绸之路”为尘砂所掩已阅数百年。时至西欧的中世,十字军时代的末期,面临咄咄逼人的回教徒和蒙古人入

^① 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 (公元前 82—30) 罗马的政治家。曾作为凯撒的部将转战高卢。凯撒死后,与奥克塔维亚努斯、雷匹铎斯一同实行第二次三头政治,并统治东方属州。后与奥克塔维亚努斯决裂,败于海战自杀。